

在族裔認同的親 私密邊境：
印尼改革時期 (Reformasi) 華人認同的一些初步觀察

蔡晏霖/Yen-ling Ts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一. 緒論。 Trafficking in the Flow of Traffics.

近午時分，印尼棉蘭市(Medan)著名的 Sutomo 學校前總是滿擠著私家轎車。路人都說，這些車是來接學校裡佔了多數的華裔學生，要載他們回家吃過午飯，再趕赴下午的華語或英語補習課程。駕車的司機們絕大部分是非華裔印尼人，在孩子每天上下學的車程裡兼任起保母，保鏢，談伴，甚至於生活與感情上疑難雜症的解惑者。笑語、依賴、與信任跨越了孩子與司機之間的族群疆界，如冷氣般在空調轎車裡循環不息。然則在孩子對司機一句句語帶稚氣的呼喚裡，也總是毫不含糊地標誌出他們之間相異的族群與階級身分。日復一日，這些轎車所引發的交通壅塞早已成為棉蘭特殊的城市地景之一，而存在於印尼華裔與非華裔族群之間的認同差異與階級尊卑也就在此一特定日常生活脈絡裡一再地被穿透與重建。

以上這一幅田野觀察速寫深植於我的博士論文核心。它揭露出存在於許多印尼華裔中產階級日常生活裡隱而不彰的跨族群依賴結構：非華裔司機以及他們所駕駛的空調私家車，動態地延展了印華中產階級「家」的範疇，車上的孩子隔離第三世界熱帶都市裡無所不在的烈日、沙塵、扒手、乞丐、甚至警察等種種族群及階級意義上的「他者」，從而提供了印華中產階級在本地公共空間裡難覓的舒適、安全、熟悉與認同感。另一方面，司機以及傭人的勞務更延展了華人家庭的經濟及社會再生產能力，使得在雅加達或新加坡商務旅行的父母們不必煩惱孩子上下英文或電腦班的接送問題。此一依賴性結構座落於這塊我暫稱為「族裔認同的親/私密邊境 (intimate edges of ethnicity)」的社會生活領域，其中處處湧生著華裔與非華裔個體間在物理、社會、及情感距離上高度接近的「跨族群親/私密情境 (cross-ethnic intimacies)」。

我的田野工作以及論文研究，便旨在紀錄並書寫這些跨族群親/私密情境，藉以探究印尼華裔與非華裔族群如何在日常生活私領域裡不斷跨越、重整、協調、再生產彼此之間相對的族裔身分差異與尊卑秩序。

以下這一篇報告包括了我在印尼棉蘭從事田野研究以來的部分觀察與體驗，希望藉由一些初步而簡單的想法的提出與與會者進行交流。呼應文章開頭的城市剪影，我在文章裡將對於棉蘭居民日常生活裡的一些空間移動經驗提出描述。描述主題有二，分別聯繫於「交通」的兩層意義：運輸、通行 (Traffic)，與交換、交易 (Trafficking)。在第一層意義裡，交通是一個社會的基本現實，也是一個社群集體對其公共空間進行集體想像與規劃控制的動態過程與表現。生

活在同一個城市，同樣的車流裡，棉蘭的華裔居民與非華裔居民對於公共空間與運輸有哪些相同與相異的經驗？而他們的條件與因應策略又為他們帶來哪些限制與可能性？對於這些問題的著墨強調著一個跨族群在地而生活化的視野，因為我認為族群研究本身不應該是一種族群化(ethnicizing)的研究。許多華人研究，即使強調在地經驗，都還是出發於華人經驗的特殊性。這樣的研究取徑往往複製了「華人」乃一疆域分明排他性強的群體形象，忽略了華人與非華人在當地生活、經驗的共同基礎。

這篇論文並針對「交通」的第二層意義：交流、交換，而對棉蘭社會關係裡的一些物質、符號、情感的交換提出觀察。對於交流與交換的觀察，源自我對族群疆界(boundary)再生產的關注。Fredrik Barth 對於族群疆界概念的研究早在 1960 年代就提醒我們：「疆界」是接觸與交通的效果，非其前提性條件。¹ 而同時期 Mary Douglas 關於污染以及象徵秩序的研究更犀利地指出，所謂「污染」與「不正常」現象所彰顯的往往不是「污染源」的存在，而是規範的失效與疆界的逾越，以及對回返所謂「正常秩序」的渴求與努力。² 換句話說，對於族群內聚力的研究，與其關注於原始的血脈關聯或非歷史的「文化傳統」，還不如近距離觀察此社群與他者的接觸，尤其著重於種種引發規範失效與疆界逾越的心理危機的特殊現象，以紀錄群體疆界於其中一再被重申、強化的軌跡及其脈絡。

交通的兩個意義 個體在公共空間裡的移動經驗，與個體之間物質、符號、與情緒的交換，提醒我觀察與紀錄特定的空間交通治權 (Spatial / Traffic Regime) 如何在棉蘭控制著身體、情感、認同的流動與形塑，並影響存在於個人、國家、社會之間的控制 / 反抗模式。以下我的觀察重點在於：在棉蘭的公共空間裡，誰與誰可以交通，誰又必須被隔離？什麼樣的跨族群交通必須被阻止，什麼樣的交通又是可欲的？族群認同的疆界如何在這些交通裡一再地被複製、強化？

二. 異化的空間，隔離的想像。

二零零三年十月，我初抵印尼三天，和朋友 Y 一起塞車在椰城(Jakarta)的環市高速公路上，動彈不得。坐在車子的前座，十五年前從棉蘭搬到椰城的 Y 回頭對我說：「我們的一生有一半的時間是在車子裡度過的。」雖然和椰城相比棉蘭的塞車問題其實不算嚴重，Y 的玩笑話卻仍足以反映棉蘭交通的部分真實：一，塞車是生活的常態而不是變態。二，如果一生有許多時間是在車子裡度過的，那麼這些時間是在哪一種車上度過的，就顯得十分重要。的確，每一個初識的棉蘭人都會問我：你住在哪裡？你平常出門坐什麼車？

在如棉蘭的印尼城市裡，交通工具的有無，尤其有沒有私人轎車，不只關乎

¹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9.)

²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1966.)

個人經濟實力，更深深影響個人對於公共空間的經驗。³ 試著走在棉蘭的主要街道上，你很快會發現每一輛車都大展所能地呼嘯來去，排放廢氣，任意超車停車，自在非常。就連垃圾、老鼠、午後雷雨也行得其所，因為街道兩側不加蓋而臭味四溢的大水溝就是它們的快速道路。那唯一找不到位置的，正是被飛車與水溝夾擊、孤單地只靠兩隻腳、被迫得左閃右跳掙扎行進的路人。偶一有之的人行道，就算不被車輛或路邊小攤販佔用，也是斷斷續續，崎嶇難行。

沒有私人車輛的棉蘭居民，在這樣一個城市空間裡所經驗到的敵意，還在於一種關於搶劫犯、扒手、騙子、半要脅性討錢者如沙塵烈日般無所不在的威脅性想像。剛認識的人會叮嚀我小心(hati-hati)以示熱絡，已熟識的朋友則習慣以叮嚀我出門小心作為告別語；總之，每個人都在警告彼此要小心。許多人說他們怕走在路上，怕搭公車、三輪車，因為會被搶，雖然說過這句話的人其中大概只有一半真的被搶過。一位朋友如此理解此一常識與經驗上的落差：「我如果走在路上，兩個小時內一定被搶。」在這種想像裡，歹徒的「無所不在」不只是空間意義上的無所不在，還更是能力上的無所不在；只要有機會，「他們」一定會搶，一定能搶。棉蘭地方報紙上最早也是唯一的投稿專欄「早安棉蘭」最受歡迎的書寫主題，就是介紹並提醒讀者們市面上最新的搶劫方法：從結夥搶劫、假車禍、催眠術、到與三輪車夫串通，無奇不有。

在這樣一個空間與社會環境裡，個體藉由不同的交通工具進行空間移動的經驗是質性差異至鉅的生理與心理過程，難以時間或金錢成本進行計算、比較。步行是一種身心探險；搭三輪車要選年紀大的車夫(據說年紀大的比較不願鋌而走險)，並記得討價還價、隨時注意路徑。不管叫三輪車還是坐公車，重要的是注意財不露白；出門，錢包或手機等貴重物件最好不帶，如果有要收在褲袋裡以便遇劫時隨時跳車或逃跑。當然，最好的解決之道還是買一輛 Toyota Kijang 或 Isuzu Panther。這兩種在棉蘭普及率最高的七~九人座家庭廂型車，不只提供循環密閉式冷氣空調以隔絕灰塵、污染、酷暑，還進一步保證人際交通的暫時中止，隔離一切搶劫犯、扒手、騙子、乞丐、街頭藝人入侵的可能。如果如 Saya Shiraishi 在她精采的民族誌：Young Heros: Indonesian Family in Politics 裡所指出，印尼中產階級對於城市公共空間的基本關係是一種對暴露(exposure)的恐懼，私人車輛所能提供的接送(antar-jemput)服務，滿足的正是此一階級對於隔離的高度欲求。⁴

Shiraishi 的洞見使我們關注到 antar-jemput 此一平凡的日常生活交通實踐的階

³棉蘭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有四種：人力腳踏三輪車，機動三輪車，公共小汽車，私人轎車。由箱型車改裝的公車提供路線固定的運輸服務，路線涵蓋全市，而且隨叫隨停，十分方便。人力或機動三輪車，像大城市裡的計程車一樣，沒有私人車輛的居民提供半個人化服務；兩種都提供等人與原車來回等服務。有些主婦甚至請熟識的車夫提供宅配服務，買完菜以後自己上美容院，託車夫把菜運回家。許多住學校附近而沒有私家車可用的家長也習慣請熟識的三輪車夫接送小孩上下學。

⁴ Saya Shiraishi: *Young Hero: Indonesian Family in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P, 1997).

級性；她並強調此階級性是一跨族群的普遍現象，而與人稱 Pak Harto (爸哈托) 的蘇哈托總統的新秩序政權所提倡的家庭意識形態國家化(領袖如父、家國合一、尊長護幼等)，以及對公共事務進行去政治化的進程與論述息息相關。具體地說，轎車接送所帶來的隔離以及舒適、安全、熟悉與階級認同，確保了個體對家庭、公司、組織等特定社群關係的依賴性。呼應 Michel Foucault 對於現代國家對其所轄人口生養教化威柔並濟的管理策略的觀察，Shiraishi 也提出在印尼，家庭及公司等現代制度對於所屬個體成員的規範力量，正是透過接送服務等照護性福利而得以最自然平常而可欲的方式達成、更新。

另一方面，我的田野研究進一步顯示：antar-jemput 及其相關的空間治權作為一個跨族群的普遍性階級現象，至少在棉蘭是被不同的族群所殊異地經驗著的，並同時呼應著個體的性/別經驗。首先，對許多棉蘭華人來說，公車與市街上的階級他者更同時是種族意義上的他者。棉蘭華人泛稱這些他者為 orang Indonesia(印尼國語)、番仔(棉蘭福建語)、或者印尼人(普通話)。相對地，棉蘭華人習慣自稱為 orang Tionghoa 唐人(棉蘭福建語) 或中國人(普通話)。因為「台灣人」與「棉蘭華人」在本地分類裡都屬「中國人」，每一個中國人阿姨阿叔阿姊阿兄得知我出門常坐三輪車或公車時，總是驚奇地問：「你不怕嗎？」「這裡的印尼人很壞，我們都不敢在路上走，也不敢坐公車呢。」有些人會再加上一句：「你一個台灣人知道在棉蘭怎麼坐公車啊？...我們在這裡出生長大的都沒有坐過公車呢。」對於棉蘭華人中產階級來說，城市裡未經隔離的公共空間不僅都是危險的，還更是異質的，是屬於「他們的人」的，不是「中國人」的。換句話說，具有異質性的不只是公共空間裡遇合的對象，而正是公共空間本身。

對於許多棉蘭華人來說，每一次的跨出家門都因而是一種異化經驗，可以被習慣，但是不能被消解。相應地，一個關於「家」的重要經驗與想像就是其隔離與保護的功能。朋友 H 在帶我去訪問她的姑姑的路上教我辨認路邊哪一間房子是「中國人的」，哪一間是「印尼人的」：「留著院子，還在門廳外面放乘涼的桌子椅子的，大部分都是印尼人的。」「那，像這裡一間一間把院子全部用鐵門鐵絲蓋得滿滿的，一定是中國人的。」一位來自雅加達的朋友看到我在棉蘭寄宿的家的第一句話是：「你住在一個大籠子裡！」保護或是囚禁，端看個體對於家以外的空間感受是親是疏。

更進一步看，棉蘭華人對於公共空間的異化經驗也形塑了本地華人社群的交通實踐，隔離了階級與種族他者，也同時促進了特定的族群內部交換。晚上十一點的 Club 裡，朋友 L 以流利的英文向我抱怨棉蘭夜店裡看不到像她一樣年輕單身的 Chinese girls。出身棉蘭但是從小離家受教育的她懷念在 Jakarta 與 LA 成群的單身朋友，有男有女，年齡相仿。她告訴我棉蘭的年輕華裔單身女孩晚上只能待在家裡，只有那些有男朋友或結了婚的，才能在男人的接送與監護之下涉足公共場合。L 因而感到寂寞；像她一樣自己能開車，有一台車可供支

配，因而不需要家人或男友接送的年輕女子，很少很少。

朋友 L 與 Shiraishi 提醒我，本地華人社群特定的交通實踐傾向於賦予某些群體身分（有車者的男性）在「和誰去」、「去哪裡」、「什麼時候去」等事務上的優先選擇權，確保年輕單身女子的行動之於家人或男友的行動的依附性，從而造成一對於年輕單身女性的身體與社會行為的規範機制，前提性地決定了她們的社會往來對象的背景條件。換句話說，轎車接送此一普遍的交通實踐影響了其？與者的社會交換實踐，進一步決定了誰與誰可以交通，誰與誰必須被隔離，也因而成為棉蘭華人社群透過異性戀婚戀機制複製其社群階級性與族裔性的重要環節之一。私人轎車隔離了一些事物的流動，卻也同時促成了另一些事物的接觸與交換。

三. 污染：隔離的失效。

antar-jemput 此一平凡的日常生活交通實踐 (traffic practice) 及其相關的空間治權在棉蘭控制著華人中產階級的身體、情感、與認同的流動，規範著哪些交通 (trafficking) 是可欲的，哪些則必須被阻止。而如果對於棉蘭華人來說，空間經驗有許多也是族群隔離的經驗，那麼公共空間裡的跨族群交通便可以以「隔離的失效」這一個概念來理解並加以分析。我把棉蘭華人企圖隔離族群與階級他者，創造並維持一個被淨化空間的失效區分為外部以及內部的失效：外部失效指的是族群與階級他者對於此一隔離在實踐上與想像上的逾越；內部失效則是此一被淨化、隔離的空間必須依賴同一族群與階級意義上的他者來維持的根本矛盾。本文開頭對於華裔雇主與其司機、僕傭之間的依賴關係的描寫正是一內部失效的例子。本節因而將不再複述此一跨族群僱傭關係，而集中於外部失效經驗的敘述。

華人在路上遇劫是一種階級與族群雙重的逾越經驗，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逾越行為的單向性。某日我和幾個阿姨一起聊天，說到棉蘭路上真是越來越不安全了。N 阿姨於是說起兩個朋友不同的遇劫經驗：一個帶的錢比較多，全部被搶走；另一個只帶五千盾，那個「印尼人」嫌少，拿著刀在她手臂上劃了一刀才滿意離去。這位只帶五千盾的朋友馬上到醫院給傷口消炎，上藥；「她看那隻刀子舊舊髒髒的，誰知道上面有沒有什麼細菌？」N 阿姨笑著說那位朋友後來花了二十幾萬的醫藥費，虧的倒比她被搶的朋友還多！阿姨們的結論是，出門身上要帶不多不少的錢，被搶了就認倒楣給錢，重要的是不要被劃上一兩刀。換句話說，錢的流失固然可惜，真正的損失卻是在身體上留下了逾越行為的後果；被搶的身體不會因為逾越行為而感到被污染，受傷的身體會。

就在最近，中文班上有學生說起被搶的經驗，我趁機要其他有遇劫經驗的人舉手，也說說自己的經驗。慣騎機車的學生 J 本來沒有舉手，卻接著一位同學的話慢慢說起兩年前的經驗：傍晚騎經大街遇上紅燈停車，車陣裡走來兩位「印尼人」，一個拿扁鑽往 J 手上劃，一個伸手往他的褲袋裡拿錢包。後來

歹徒在錢包裡只發現名片與銀行提款卡，打電話找 J 說在公車上撿到他的提款卡，藉口要約個時間地點把東西還給 J。J 說他有衝動想以此為餌，找朋友一起赴約好報復搶匪。後來因為家人阻止，自己也覺得不妥而作罷。有同學問歹徒有沒有找到家裡去？J 回答還好名片上只印了公司的電話。與阿姨 N 相同的是，J 與家人同學們關注的是確保搶劫所造成的隔離關係的逾越只是暫時且單向的，不會有任何可能的後續發展。J 的報復想法遭到阻止，因為反抗、報復等行為是一種回應，而任何回應都將複製「印尼人搶匪」對於華印隔離關係所行的逾越。⁵

本節的最後一個例子陳述一種象徵意義上的跨族群逾越關係，並指出華印之間的近距離接觸，尤其異性之間的接近，在棉蘭公共空間裡的異質性。二零零二年八月底我第二次到棉蘭進行語言學習與田野預備工作，並曾和一位馬來朋友 F 遭到一位原住民司機的語言攻擊。F 事後解釋，在棉蘭一般人不習慣看到有華人女子和非華人男子在一起。看到 F 用摩托車載著我等紅燈，司機馬上有聯想，拉下窗戶玩笑性的和 F 說了一句 *bawah pulang* 意思是：帶回家？) 只因為我是華人，F 是馬來人，我們共乘一車的景象在棉蘭的在地語境裡就輕易給出一種負面意義，涉及了男女間曖昧而具金錢交易性質的私密關係。類似情境並曾再度發生；某次結束和一位記者的談話後他表示可以用摩托車送我一程，只要妳不會不好意思。我有一點明知故問地問為什麼，而他的答案是：妳是華人，我們不一樣。

當然，對於隔離失效的討論不能忽略：中產階級與華人實踐空間上的自我隔離，目的在於避免一種可能的身分暴露(*exposure of identity*)，一種可能引發逾越危機的暴露。弔詭的是，前文所提私人冷氣車所指涉的階級性，與鐵絲重重的房子所指涉的種族性，卻正使得其中的人成為最明顯的攻擊目標。換句話說，空間的隔離實踐完成了身分的暴露。在這一層意義上，所有的隔離都必然是失效的。

四．結語：華人在印尼---一個跨族群的親 / 私密關係史

近來 Ann Stoler 對於荷屬東印度的白種殖民者與原住民被殖民者之間的歷史性研究，透過新聞、小說、照片、法庭紀錄、口述歷史等材料，追溯白人與其原住民保姆、家僕、侍妾、妻子與混血子女之間乳汁、體液、體溫、膚觸、情感、情緒，與認同的接觸與交換。⁶ 關注於國家如何透過差別化的法律與行政管理對

⁵ James Siegel (1999)、Abidin Kusno (2003) 都提到 1998 年五月發生於 Jakarta 的排華暴動的特別之處在於集體強暴華裔婦女的犯行是一族群逾越行為所造成的親密情境的不可被消失性。異己性(*Otherness*) 的恆久存在造成五月事件的不可再現(*unrepresentability*)。參考 James Siegel, "Early Thoughts on the Violences of May 14 and 14, 1998, in Jakarta," *Indonesia* 66, (October 1999): 75-108. Abidin Kusno, "Remembering /Forgetting the May Riots: Architecture,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Cultures" in Post-1998 Jakarta," *Public Culture* 15(1): 149-177.

⁶ Ann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2002)

於這些交換進行命名、分類、檢查、控制， Stoler 指出，這些柔軟而又充滿張力的跨族群連繫(tense and tender ties)正是現代國家對其所轄個人的身體與生命進行教化、管裡的重要場域。我取法 Stoler 觀察不同族裔主體間親密、私密情境裡的微型政治(micro-politics)，試圖在這些常被去政治(de-politicized)且平庸化(trivialized)的日常生活族群認同場域裡，重新發現權力運作複雜且充滿韌力的細微軌跡。我更進一步試圖拓展「親/私密情境(the intimate)」的概念領域，使其涵攝個體間在物理、社會、或情感距離上高度接近的狀態，由此嘗試將華裔與非華裔族群間的肢體與象徵性暴力交換也納入此一分析體系。在此一初步嘗試下，我所書寫的跨族群連繫與近距離交換未必柔軟，但仍充滿張力。

我的研究有別於海外華人研究著手政治經濟結構分析或歷史？事的宏觀型研究範式，從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跨族群親/私密情境出發，企圖理解歷史書寫、族群政策、權力結構等鉅視性分析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政治(everyday politics)裡被活生生地經驗與實踐。然而我也希望提出，無論從印尼的殖民與國族歷史出發，或是考察其當代政治經濟結構，所謂的「華裔族群」與「原住族群」之間在生活與經濟上緊密相依的關係以及周期性的暴力衝突關係，似乎也點示著一種既柔軟又充滿張力的跨族群連繫結構。的確，十五世紀中葉以前「華人」就已在馬來亞、爪哇、蘇門答臘沿海城邦與當地統治商業精英通婚通商，並在接下來兩個世紀裡與來自歐洲、日本、阿拉伯、印度、東南亞各地的商人共創一個媲美地中海區商業與文化榮景的東南亞海上貿易盛世。⁷ 來自中國的勞力階層與小商販與當地勞工一起於十七世紀建造 Batavia 城，在十八世紀的西婆羅洲開墾農園與礦場，也在十九世紀的棉蘭日里當苦力或種蔬菜。⁸ 而近代印尼國族主義的發展更有著荷屬東印度地區華人革命知識份子影響、⁹ 與、或競爭的斑斑軌跡。⁹ 一個大象度的歷史考察因而提醒我們：在荷屬東印度，「華人」作為一個獨特的種族分類範疇其實是一個殖民性與現代性的產物；國家、人口、種族、族群、文化、認同等等概念的移植與生成，工具性、回溯性地消抹了以上這些多重且異質的跨地域族群長期往來依賴脈絡。「華人」在印尼的歷史其實是一部跨族群的親 / 私密關係史；「印尼華人」作為一少數族裔標記的生成、再現、與再生產，並不是存在於「華裔族群」與「原住族群」之間族群衝突的表徵與爆發，

⁷ 參考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Two vo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Flows and Seepages in the Long-term Chinese Interac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In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Anthony Reid ed. Pp 15-50. (Sydney: Allen & Unwin, 1996.)

⁸ 參考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is for KITLV, 1986). Mary Somers Heidhues: *Identity and the Minority: Ethnic Chinese on the Indonesian Periphery*. *Indonesia Circle* (70):181-192 (London:1996), and *Chinese Settlements in Rural Southeast Asia: Unwritten Histories*. In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A. Reid, ed. pp. 164-182.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6,) and Nancy Peluso: *Weapons of the Wild: Strategic Uses of Violence and Wildness in the Rain Forests of Indonesia Borneo*, (Berkeley: 2001.)

⁹ 參考 Takashi Shiraishi, *Anti-Sinicism in New Order Java*. In *Essential Outsiders*. D. Chirot and A. Reid, eds.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997.) Pramoedya Ananta Toer: *Child of All Nations*. M. Lane transl.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6(1979).) Lea Williams: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 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60.)

而正是這些親 / 私密關係不斷被邊緣化、概念化、規範化的歷史性結果。